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探析

——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季春芳 赵文能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大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毛泽东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辩证考量“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与“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的双重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构建正规化管理体制、加强科学化军事教育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长期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不仅促进了新生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启示与经验参照。

关 键 词: 毛泽东; 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国家治理

DOI:10.14130/j.cnki.mzr.2021.02.009

国防和军队建设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新中国具体实际,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重要

作用。当前,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季春芳,女,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 赵文能,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实践及其经验启示研究”(项目编号: AHSKQ2019D002)。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我党维护国家安全、确保执政地位的必要举措。毛泽东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大局出发,总结历史经验、立足客观实际,始终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新中国,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未曾有过的挑战。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捍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分析、解决问题,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做出不竭努力。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军队理论的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军队理论有着丰富内涵,给了毛泽东诸多启示。首先,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军队必须接受所在阶级的政党的领导。1905年11月,列宁在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深刻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出路的基础上,在《军队和国家》一文中提出“军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保持中立。”^①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军队的阶级性,分析了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了军队接受所属阶级政党领导的必然性。

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人民军队天然地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其接受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了必然。人民军队,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也成了其使命所在。其次,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由统治阶级的政党来掌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当阶级开始出现,且阶级矛盾上升至不可调和之状态时,国家便应运而生。军队,则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②,因此,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掌握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寻求执政权的共产党,对这一认识的领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大革命失败这一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清醒地看到了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枪杆子”与“政权”的必然联系。在历经多年革命战争后,毛泽东更加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性,并在实践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12月6日,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地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③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代表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权,因此,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夺取政权之后要巩固政权,更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后,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必须要领导无产阶级的军队。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军队的绝对领

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导,是国家履行职能的内在要求。1850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时,对无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无产阶级军队做出了深刻分析,同时要求“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①。此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捍卫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对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大乱归治,百废待兴,党肩负着国家治理的艰巨任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现实形势下做出的正确抉择。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幼年时期,党还没有形成关于坚持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明确意识和完备理论。在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放弃了对于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这也成了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历大批党员群众被屠戮、红色革命力量被削弱的教训之后,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重

要论断,强调了军队领导权与革命成败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其后革命战争的事实也证明了,“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③。在边探索边总结的革命实践当中,党与军队的关系在毛泽东的思维里更加清晰明朗起来。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强调了“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④的坚定原则,党与军队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进一步被确定下来。在此后的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真理性认识得到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在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高度评价了人民解放军对于新生人民政权的伟大贡献,指出如果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没有新中国^⑤。

二、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的双重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强劲发展动力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历经百年战乱后的中国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根据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军队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双重作用的论断,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军队功能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军队理论。

(一)“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坚守军队在国防中的作用

在国防和军队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①的指导思想,全面深入地考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国际、国内面临的客观形势,分析了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必要性,为国家安全与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解放战争结束后,党的军事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夺取政权转变为保卫政权。但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使得人民军队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威胁。在国际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是之所以保持人民解放军战斗队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除在非军事领域给中国制造各种困难外,还在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挟制打击。1950年6月27日,美国对新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采取了强硬的干预措施,其驻太平洋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次日,美国非法纠集的“联合国军”,武装入侵朝鲜,使新中国面临唇亡齿寒的危急状态。据统计,“仅1951年至1953年间,美国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就达32126架次”^②,对新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针对帝国主义的恶劣行径,毛泽东认为,只有自身强大,才能不畏强权。因此,加强军队的国防功能,随时应对敌对势力的挑衅,是强军强国的必要之举。此外,在中国边境地带,印度趁西藏还未解放之机,派遣军队越过中印传统边界,强行侵占我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于1954年在上述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之上成立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直属印度中央政府,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对于新中国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势力层

层包围中国的事实,并告诫大家要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避免措手不及以致被动挨打^③。在这一对世界局势尤其是对我国周边局势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心怀忧患意识、保持思想警惕、注重提高军队实战能力的思想,不仅对巩固新中国起到了极大作用,且对新时代党的国防与军队建设亦有着重要启示。在国内方面,肃清国民党军队的后期作战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都需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队作用。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正规军虽大部已被歼灭,但中国的西南、西北、华东地区以及部分岛屿还残留着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负隅顽抗,意欲卷土重来。彻底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解放中国全境,必须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队作用。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武装力量下,我军先后发动了衡宝、漳厦、西昌以及海南岛等战役,解放了湘西南地区、福建全省、滇南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除消灭国民党军队外,新生人民政权还面临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任务。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把大批特务及正规军遣散为匪,这些匪徒与旧官僚、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相互勾结,形成了对新中国政权产生严重威胁的反革命势力。这些反革命势力在大陆发动武装暴乱和破坏活动,攻陷、占领百余个县城,甚至建立伪政权,企图配合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破坏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要求彻底消灭继续顽抗的匪特武装力量,体现了毛泽东大力剿匪的决心和对人民解放军战斗队作用的高度重视。只有保持人民解放军的战斗队作用,才能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才能为接下来大规模建设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4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二) “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 发挥军队在生产中的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战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宝贵时期,抓住发展机遇,努力促进生产,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唤。毛泽东在把握时代趋势、顺应人民要求的基础上,于1949年3月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①的论断,全面阐释了人民解放军成为工作队的可能性,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功能多样化和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首先,“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人民军队有精力腾出时间来搞生产。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对解放战争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预测出了“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②。同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形势下,考虑到国家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等客观需要,又创造性地提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③因此,人民军队在担负好国防任务的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这对于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是有利的。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建设,需要人民军队成为生产队。长期的战乱“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④,恢复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解决财政收支不平衡等问题,是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和现实难题。

因此,党需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使其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地恢复发展生产。但人民解放军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也“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大的战争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生产任务亟待完成的特定时代条件下提出的,充分地考虑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最后,部队的兵源允许军队成为生产队。毛泽东分析了军队的士兵来源,回顾了军队的发展历程,展望了军队成为生产队的美好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劳动人民中间,本身就掌握着各种生产技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着担任生产任务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加之党的长期教育,思想觉悟普遍较高,具备成为生产队的过硬素质。而军队成为生产队之后,既能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亦能有效改善军队生活质量、减少政府财政负担,还能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队参与到国家生产建设中去,让人民解放军成为工作队,是毛泽东立足于新中国现实情况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对国家治理思想与国防军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三、加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提供长期安全环境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没有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民军队 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才能促进我国军事发展 ,为党的国家治理提供长期安全的有效支撑。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 ,为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构建正规化的管理体制、发展科学化的军事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应对现代化战争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新的科学技术加速了新的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毛泽东以其长期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对世界军事发展的科学把握 ,充分意识到现代化武器装备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性 ,并多次就该问题做出重要指示 ,对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也为其后乃至新时代党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刚成立时 ,我军的武器装备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世界军事科技的进步 ,倒逼着新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加快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更新。在抗美援朝作战中 ,美军武器装备明显优越于我军。在直观的对比中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针对这一客观情况 ,毛泽东进行了深思并采取了实际行动。1951年6月1日 ,毛泽东致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在客观对比中美军队武器装备的基础上 ,坚定地指出“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 ,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 ,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①时代的发展推动着认知的前进 ,在日新月异的革命建设实践中 ,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

于现代化武器装备重要性的认识 ,并以其宽阔的国际视野 ,与时俱进地寻求多元路径来促进新中国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作战水平的提升 ,为国家和人民福祉提供强大保障 ,彻底扭转旧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侵略的被动局面。1953年1月7日 ,毛泽东在给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 ,详细分析了当时我军武器装备的现状及其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深刻阐释了掌握最新武器装备最新战略战术的迫切性 ,并客观指出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必要性 ,要求“我们必须向苏联军事科学学习 ,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实现 ,还需要有效的科学技术支撑。为此 ,毛泽东还以陆军、空军和海军不同军种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强调机械化装备必须依赖于高端先进的专业技术支撑^③。毛泽东对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之间密切关系的深入分析 ,为建设现代化国防指明了发展路径 ,也促进了我国军事科技的飞跃与提升 ,为其后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4月25日 ,总结新中国建设经验、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对我国军事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大胆的预测“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 ,以后还要比现在强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④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强调了要不断发展军事科学技术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很快得到了有效提高。自1949年至1956年 ,我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 ,建立了自己的坦克研究机构和工厂 ,自行研制了第一架飞机“初教-5” ,原子武器的研究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286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337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35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7页。

也被提上日程,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防御武器等得到质的提升,国防和军队的武器装备迈上了大的台阶,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夯实了根基。

(二) 构建正规化的管理体制

正规化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革命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客观环境的差异性和生存环境的严酷性等原因,我军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分散、落后等不足之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对构建正规化的管理体制采取了新举措。

毛泽东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管理体制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他科学认识到当时已是建军的高级阶段,推进军队管理体制正规化建设,已成为现实所需、形势所趋。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部分不集中、不统一的纪律不严状态和游击习气,需要得到彻底扭转和改变。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①严格统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利于提高诸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从而更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下的战争需要。因此,正规化管理体制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②。基于这一重要认识,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就军队管理的正规化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颁布了一系列诸如《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新制度,逐步健全完善了军队的管理体制,使得军队有令可依、有令必依,大

大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其次,改革了一部分不合理的旧制度,以义务兵役制代替了志愿兵役制,以薪金制代替了供给制,积极主动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调适军队的政策,为军队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带来了更新的动力。再次,引进了不少适合我军具体情况的苏联军队优秀条例,为军队建设注入新血液。当时的苏联军队战斗力强大,这离不开其相对先进有效的管理体制。有比较、有辨别地学习苏联,对于促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防和军队管理体制建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对于后勤保障体制,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看来,“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③。这一对后方勤务工作的肯定和对少数人轻视后勤工作、没有对后勤工作给予正确评价的否定,对于健全和完善新中国后勤保障体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全军更进一步明确了后勤保障体制在军队正规化管理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加强了作战物资的生产储备,提高了军械车船的运输能力,建立了野战救治的医疗体系,为推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发展科学化的军事教育

科学化的军事教育是军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在战斗力上的重要决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并以实践行动发展了新中国的军事教育。

由于诸多客观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我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总体不高。为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更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有效地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是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必要之举。基于这一客观情况,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有针对性地要求全军在执行常规性的作战、生产任务之外,还要加强文化学习,切实提高文化素养^①。人才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对此早有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②这一彰显毛泽东长远战略眼光的论断,揭示了“人”对于军事科技的统领作用,强调了军事人才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键作用。新中国改建、新建了包括各兵种的一大批军事院校,“到1957年,全军创办了165所正规院校,基本形成了初、中、高衔接,军兵种齐全的比较完整的正规化军校教育体系”^③。军事院校的建立,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军事人才,这就离不开军事院校的学员培养工作和教员队伍建设。在学员培养方面,毛泽东指出“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④1954年3月,中央军委还组成了对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军事院校毕业生

进行考核的国家考试委员会,严格确保学员培养的质量。在教员队伍建设方面,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⑤,强调了德才兼备教员队伍的不可或缺性。此外,在毛泽东的直接选调下,刘伯承、罗荣桓、陈赓等一批久经考验、战功卓越的高级将领成为军事院校的领导人,彰显出毛泽东对科学化军事教育的高度重视。而毛泽东对于科学化军事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既在客观上培养了大量军事科技人员,促进了军事人才梯队的形成,为其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又在思想上促进了党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发展成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军队理论的中国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军之路打下了思想根基。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大局出发,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的双重作用,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斌)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③薛连璧、张振华《中国军事教育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